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一世纪中小生素质教育文库(1)

人格·气节

 **E-BOOK**
网络百科 中华精英

人格·气节

人格

人格，青年的热门话题。

当历史进入了 20 世纪 80 年代，被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中华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人自身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人自身的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对社会变革最敏感的青年们一面关心着时代的发展，一面更多地把目光转向自己，探索人生，剖析自我，渴望开发潜能，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们开始涉猎中外学者关于人格发展的学说，大量西方人格理论著作摆上青年的案边床头，对他们产生着各种影响。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们也开始认真探讨人格及人格健康发展途径，关心在社会变革时代青年能否适应新社会条件，提高心理素质，确立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建立新型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以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塑造、培养出具有健康人格的新一代。

基于上述现实，了解西方的人格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地分析及评价，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建立科学的健康人格的标准，探索正确的培养途径，造就千千万万个健康的人格，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现代比，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人格热的缘由

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人格

人类对自身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求识探索。当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后，就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开始了对人自身的认识。但是，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格探求则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著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对人性和人的行为有过许多论述。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人格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人格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许多领域，包括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的专家学者，都对人格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

人格究竟是什么？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概念看似简单，其实却极为复杂。人格是指一个人的特性，是对他的总的、本质的描述。因此，人格的内涵和外延相当广泛和丰富。它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心理学概念，又是一个伦理学概念、社会学概念和法学概念。美国著名的人格理论家 G·W·奥尔波特 30 年代曾综述前人关于人格研究的成果，概括出 50 多个人格定义。这充分表明，人格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存在颇多的歧义。人格定义的多样性一方面说明了人格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格研究的广泛性。

西方的人格一词 personability 源于拉丁文的 person - a，原指“面具”。面具是舞台上扮演角色所戴上的特殊脸谱，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角色特点。将“面具”的意义指人格包含了两层意思：即人在生活舞台上表现的种种行为和一个人真实的自我。从西方大多数现代人格主义的基本倾向性界定来看，人格定义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最为通行的是把人格界定为个人内在的，全部生理、物理结构和心理意识外在化的状态，其次是强调人的个体差异性，从个人心理行为特点的一致性中显示人格内容；再次是从人的生活过程中去定义人格，强调环境、社会影响和后天学习的相关因素。最有代表性的人格定义是奥尔波特提出的，他认为人格就是一个人真正是什么。他进一步解释，人格是在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对环境顺应的独特性。

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格的不同定义，人格应当是：以精神面貌为核心的，身心统一的、与他人相区别的一个人的总体特征。由定义可见，人格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它是心身统一，内外统一的整体；它包括人的各种心理过程，人的认知能力、行为动机、情绪反应、人际关系、态度信仰、道德价值等是构成人格的要素。人格是在人的社会过程中，在遗传、环境、学习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对一个人的人格进行判定时，必须考察他的内部心理特征与外部行为的特征。

马克思认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明确指出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黑格尔“抽象地、单独地来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力，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做它们的对立物”。他认为，国家的特殊职能和活动“实现它们的个人发生联系，但是和它们发生联系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个人人格，而只是这些人的普遍的和客观的特质；因此它们是以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同这种特殊的人格本身相联系”。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指出不能割裂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并把它们对立起来。个人的人格与作为“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的国家职能的联系不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而是“突体性”的联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

人格热与改革开放中经济关系的变动

根据马克思的关于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这一基本观点，我们就能找到分析“人格热”缘由的正确线索。“人格热”的深层动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关系的变动。

第一，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使个体的素质人格变得更为重要，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人格，才能在生产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济改革确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在于他们个体的素质和人格，特别是企业领导者、决策者的素质和人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具有许多与产品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素质和人格。马克思称实现商品价值是“惊险的跳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搞生产和经营就必须承担风险，而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很少甚至不会提出这种人格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总是具有敢于承担必要风险的心理素质。一个厂长的素质与人格关系到一家企业的兴衰成败，这是众多事实所证明的。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从事个体经营的人们，要想获得成功，他们的素质与人格如何也显得非常重要。在个体户经营的服装、水果、农副产品等行业中，竞争激烈。只有善于捕捉信息，善于经营，才能占据竞争的有利位置。个体户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中，需要不断地塑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人格。

第二，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使人生价值的思考变得更为突出，一个人对义利问题的态度也表现了他将按照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塑造自己的人格。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从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中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出不同层次的人格，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格。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物质生活需要更为重视，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人格塑造颇为流行。但是，有的人见利忘义，以致形成了畸形人格、病态人格。当然，也有些人对于重义轻利的人格塑造也不赞同。那么，应该如何设计和塑造自己的人格，满足人性的各层次需要，同时又不断走向高层次的人格境界？这是人们所感兴趣的。

人格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有人在上海近 5000 市民中作过一次道德心理调查。调查显示，有 27.71% 的人以为“重义轻利”可取，而有 29.22% 的人以为应予摒弃，否定者超过了肯定者。重义轻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它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我们是站在中华民族“黄土地”上来谈论新时期人格塑造的，“人格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相伴而生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的主要内容是伦理性质的，人格与伦理人格几

乎可以等用。实行对外开放后，我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生产力，看到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炎黄子孙总是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如何改变落后？许多学者从人格入手，剖析中国伦理人格的利弊得失，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的青年学者措词激烈，认为只有在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商品经济条件下现代中国的人格问题。

在“人格热”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问题的评价，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传统人格精神确实与现代人格精神有冲突，著名学者张岱年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 尊官贵长与民主精神的冲突；
- 因循守旧与革新精神的冲突；
- 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
- 悠闲散漫习惯与重视纪律、效率的冲突。

但是张岱年还认为传统人格精神与现代人格精神有相契合的一面。

首先，民本思想。中国虽然没有成熟的民主传统，可是有民主思想。“民为邦本”，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孟子的“民贵君轻”肯定人民的需要。

其次，革新思想。《易传》曰：“革去故，鼎立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而通之以尽利”。

再次，重视人格独立。中国过去缺乏明确的个性自由思想，但比较重视人格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赞美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战国时代还有一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对于知识分子，你可以把他杀掉，但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张岱年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当然不能对传统人格精神中封建性的糟粕兼收并蓄。但是我们更不能对传统文化中其民主性的精华视而不见，甚至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包括中国传统人格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使中国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即使在现代生活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可批判继承。另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是具有连续性的，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割断历史。脱离原来文化的基础而谈论新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民族虚无主义带来的是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利于中华民族人格素质的培养。

人格热与西方人格热

近几年来中国的“人格热”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的，有关现代西方人格问题的理论著作被大批介绍进来。“人格热”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格热”。正确分析现代西方的人格理论，科学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对于中华民族人格理论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人们所关注的。

现代西方人格理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人格哲学和人格心理学。两者所研究的中心都是“人格是什么”，但前者从最根本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以抽象和思辨的形式提出关于人格的一般理论，而后者侧重研究人格的内在结

构、特质和因素，人格的类型和模式，人格的发展与人格障碍等具体问题，并进行一些实验的和实证的分析。两个层面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对现代西方人格哲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追溯到叔本华意志哲学那儿。19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人生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他认为要阐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必须回答人是什么。在他看来，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格问题。他指出：“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叔本华认定意志是人的本质，是人格的根本和动力，而意志是盲目的欲求和永不疲倦的冲动，这本身就意味着痛苦。他的结论是：我们的由意志决定的人格只是一种痛苦型人格。

尼采在年青时曾经接受过叔本华的人格哲学，但是后来他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转变为权力意志，把痛苦型人格转变为超人型人格。尼采并不否认人生的痛苦，他主张人不应逃避痛苦，而应勇敢地面对痛苦，在超越人生的痛苦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超人”是尼采提出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理想表明他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的“非人格化”的忧虑，并试图寻求重新给人以价值和尊严的道路。但是，这种人格理想的实现，却以牺牲弱者和成全强者为途径。尼采的“超人”充盈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情绪，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民主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化伦理倾向，以致被德国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现代西方人格哲学流派除了唯意志主义外，还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存在主义是一种较为完备的人格哲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之一，他以“孤独个体”为核心概念提出了他的人格学说。他把个人归结为精神性个性，认为恐怖、厌烦、忧郁和绝望等情绪状态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并以此来揭示人格的本质。克尔凯郭尔所描写的四种情绪状态实际是一种病态的人格特征，他的人格理论是一种关于病态人格的学说。克尔凯郭尔提出了“选择你自己”的口号，认定“选择”是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人生选择面临着至少三种主要的可能性，他把这些可能性称为“人生道路的不同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萨特等存在主义者发挥了克尔凯郭尔相关个人选择的观点，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告诉人们，人是被突然抛进了一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不断地设计、不断地选择，才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和人格。存在主义肯定了选择在人格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无道理，但是这种选择轻视和否认人类活动中的那些客观的和必然的因素，既无根据，又无确定的标准，是建立在主观随意基础上的，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存在主义把人格引向人的存在自身，而人格主义则把人格引向人的存在之外。在人格主义那儿，人格具有本体论的意蕴，它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础，整个世界都因与人格相关而获得意义。人格主义者认为人格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具有自身同一性、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人本身的力量即人格决定了人的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每一人格均朝向一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人格，即上帝。上帝是每一有限人格的理想和归宿。人格主义的特点是将基督教神学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融合在一起，它的主要根据地在美国，而波士顿大学教授鲍恩被公认为美国人格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

在剖析西方人格哲学各流派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德国哲学家舍勒，他对

人格与价值关系的研究，开拓了人格理论的一个层面，并对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现代人格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舍勒看来，人是在实现价值的道德活动中同时实现了人的理想人格。他提出了一个价值的等级序列，每一价值等级不仅充满相应的情感、内容，而且有一个对应的从低到高的理想人格的发展序列，这就是感性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宗教价值，与此相对应的理想人格是享乐的艺术家人格，杰出的领导人、英雄、天才、圣者。

在人格心理学中，主要有三大流派：行为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其创始人是心理学家华生。华生把心理学规定为关于行为的科学，并把人的全部行为归结为有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动作，认为只要分析刺激——反应，就可以掌握行为的规律，有效地理解、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并且按照环境来塑造或改变人的人格。华生的行为在当时曾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但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并无多大的吸引力，在“人格热”中很少有它的位置。而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本主义颇受一些青年人的青睐。

如果说行为主义的人格结构是人的外显行为模式，那么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格结构则是人的精神状态系统。弗洛伊德把本能作为人格的动力基础，认为人格的所有结构部分都起源于生物本能，而他的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探索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他把一个人格心理过程的动态结构分为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三个部分。其中无意识处于深层，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一切活动的动力根源。

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描述了人格的组织结构。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的整个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大部分组成。在一个精神健全的人身上，这三大系统统一和谐，使人们的基本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而当这三大系统相互冲突时，人就会处于失调状态。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所谓“本我”是人格的初始面，是非逻辑、非时间和非道德的，“自我”是人格的逻辑面和条理面，是以知觉系统为核心而构成的意识自我，而“超我”是人格的最高层，它代表良心、自我牺牲。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包含了不少超传统的见解，对我们了解人格和人的行为的深层底蕴，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但是他把人格发展以致整个社会文化都说成是本能欲望的原始冲动的作用，失之偏颇。这个无可弥补的缺憾，引起了他的学生们的反叛。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格理论的杰出代表者，他与弗洛伊德明显的不同点在于他着重研究健全者的人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研究病态者的人格。弗洛伊德把人格的动力基础归之于无意识与性本能，而马斯洛则持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应该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研究，从整体多维的角度来考察人格的动力问题。他把人格的动力归之于需要，但这需要又决不是像弗洛伊德那种单纯的生理的性需要，而是多重的，复杂的，高低层次不同的需要，其中既有生理需要，也有心理需要；既有物质的需要，也有精神的需要。他的需要五层次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罗杰斯的注重人格趋向和自我形成的人格理论和阿尔波特的人格特质论也是很著名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阐述。

总之，西方的人格理论学派众多，内容丰富。改革开放使人们有机会接触这些人格理论，促进了人们对人格问题的兴趣，推动了“人格热”的升温。研究西方的人格理论，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它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而且这些人格理论中，也包含有一些真理的颗粒，例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但我

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西方人格理论在价值取向上是以“个人为中心，自我为本位的”，换言之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尼采的“超人”人格和存在主义的“选择说”中。在理论研究上，西方的人格理论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它们一反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人的非理性一面，例如，意志、情感、性本能，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格理论中非常明显地体现这一理论特征。在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人格理论往往充满着悲观主义情绪。站在社会的对立面来谈个人的发展，往往悲观；脱离理性来谈人的情感，往往令人失望。

当代中国的“人格热”不仅缘于经济关系的变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西方人格理论的涌入，而且与人格理论本身内涵丰富有关。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可找到自己研究的位置，不同层次的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不难预见，人格热问题还会持续下去，并且研究的范围会越来越宽，研究的内容会越来越深入。

理想人格与应有人格

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

人，不同于自然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每一个人追求他们自己的自觉期望的同时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通过理想人格的范导而形成塑造自己的人格。那么，什么是理想人格呢？所谓理想人格就是道德原则规范的结晶和道德的完美典型，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理想人格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一定的阶级意志和时代精神。理想人格高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格，是现实人格的升华。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唯有如此，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成为人们完善自己人格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电视连续剧《渴望》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厚爱，以致在它播出时，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况。这是因为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表达了人们心灵深处蕴藏的“渴望”：对真善美人格的追求，对现实人格中假恶丑的痛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也不会泯灭人们追求真善美之心。恰恰相反，人们对真善美理想人格追求的脚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

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人类孜孜不倦的崇高境界。早在 2000 年前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把真与善统一起来。柏拉图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人通过理性观到理念本体世界，灵魂达到了真善美统一的境界。而康德写了三本著名的批判作品，建构了一个真善美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影响甚远。《纯粹理性批判》解决我能够知道什么，以求得真理；《实践理性批判》解决我应当做什么，以求得善。康德用判断力的理论沟通两者，写了第三本《批判》即《批判力批判》，人类理性表现为批判力，自然向人生成，以求得美。

1. 理想人格中的“真”

从著名哲学家特别是康德的理论体系中，我们不难找到认识真善美本质的思想线索。“真”解决我能够知道什么，属于认识论范畴。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人的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是工业和科学，是“物质群众”利用“物质自然”进行的“物质实践”。人在认识客观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其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丰富、越深刻，掌握的和真理越多，就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些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丰功伟绩的人们，例如牛顿、爱因斯坦，总是受到人们的无比崇敬。知识和真理作为智慧力量在理想人格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是应有之义。

2. 理想人格中的“善”

理想人格中的“善”解决我应当做什么，它的本质是以人类社会内在关系为准则的道德价值。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物，与动物那种无意识的生命活动相反，人在自己的活动之前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即有目的。从价值论角度看，在人的主体活动中，总有一定的价值目标存在。人们总是追求一定的价值目标，超越现实的规定，并通过实践活动使自己成为合乎理想要求的人。“应当做什么”体现了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个体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真与善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两者又是可以统一的。柏拉图认为善本体

不仅是道德和道德观念的来源，也是万物的本源，他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真与善统一起来了。而在中国哲学中，真善是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哲人认为至真的道理就是至善的准则，求真即求善，不能离开善而求真。如果离开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而不能得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致知与修养密不可分，对宇宙真理的探求与人生至善的达到，是一事之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

黑格尔有句名言：“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依据这种认识对客观现实的能动改造。这也就意味着善是主观目的和客观现实的一致。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时指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是人的实践要求的外部现实性。”“善”与“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最大的善行，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并运用这些规律去创造性地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向善必须求真，向善包含求真。

3. 理想人格中的“美”

正确理解真与善的统一，我们才能认识理想人格中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而真与善的统一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马克思关于美学理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即“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这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亦即事物的“真”。第二个“尺度”，即“内在的尺度”，是指人的尺度，即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与目的。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必然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真”，即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是“善”，即把握与实现主体的目的性。这种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构成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把自己掌握真和实现善的本质力量通过感性形象在对象中显示出来，这个过程及对象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理想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导致人格的畸形，影响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这在不同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情形。

西方理想人格中突出知识、智慧的作用，这无疑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也带来了种种弊端，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人际关系的疏远、空虚感、焦虑感的增加或曰精神危机。而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兹，把解脱精神危机，建设世界文明的希望寄之于中华民族身上。汤因兹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以伦理为本位

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以善为核心。西方文化是外倾文化，强调外在超越，强调对外在必然性的认识，对外部环境的改造；而中国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超越，强调内省智慧。古希腊人专注于自然哲学的探究，刻意觅求宇宙的终极本体，以说明宇宙万物的发生和发展。在古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自然崇拜占主导地位。文化源的不同特点对中西文化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西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设计形成不同的侧重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看作是治国之本，也看作是理想人格之本。黑格尔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理想人格的设计和追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设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当然应是真善美的统一，这种设计和追求是建立在科学地反思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我们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人格因素中的智慧力量是必要的，西方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不仅要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要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要促进每个成员的自我完善，中国传统文化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兼收并蓄。西方理想人格中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均应在摒弃之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不问青红皂白，把外国的东西都打入“另册”，这是不正常的。改革开放，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开放，也应包括精神文明的开放。但是，近几年来，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东西一概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而对中国传统的精华又不屑一顾，视而不见。这是错误的。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像庖丁解牛，作一番分解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设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与西方的和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有着“质”的区别，这种理想人格是和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真善美的统一。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真”的；它以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指导人们的行为，是“善”的；它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是“美”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也应是真善美的统一。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为此他要求青年学习、学习、再学习；毛泽东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马克思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证明。

应有人格是现实人格走向理想人格的中介

理想人格是值得我们追求和达到的人格目标，它与我们现实生活实际的人格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现实人格走向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我们还可提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格概念——应有人格。

诚然，理想人格与应有人格有许多相同之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代换。因为两者都以超越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了人的价值取向，都是必然性的表现。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严格地说，两者不能划等号。应有人格比理想人格更具体，更接近于现实，更具有操作性。如果说理想人格可能属于将来，并且距离现在相当远，那么应有人格属于今天的现实。应

有人格指令现实中的哪些方面在今天已是必须改善或改变的，并以规范和命令的形式对现实和人的行为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这些规范和命令在现实生活中有较强的操作性，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因此，应有人格的提出是社会成员道德活动的推动力，是改造当今现实的实际力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可表述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个方面。

应有人格的“有理想”。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对内实行经济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我们的理想。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中国的改革如果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化，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私有化与我们的理想，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在对外实行开放中，我们也要“冷眼向洋看世界”。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国际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处于和平共处状态，而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利用这种机会，加紧对我们国家展开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以期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中的有理想意味着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开放中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应有人格中的“有道德”。有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人格中的题中之义。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与不发达的生产力相联，要使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实现经济的腾飞，就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每个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没有亿万人民的献身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带来道德观念的变化，但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否认。竞争不再是道德的对立物，但竞争不能背离社会的道德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不能见利忘义，泯灭人类良心；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私自利，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受到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谴责。我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人是指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就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要具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而对社会的先进分子来说，应当具有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

应有人格中的“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其中包括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里，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对企业的命运生死攸关。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当前青年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有所减弱。“学富五车书呆子，生财有道小财主”，既然知识的多寡并不与个人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中“流生”增多，不少青少年弃学经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应有人格的塑造必须强调“有文化”的内容，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改变生活中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当然，我们所说的“有文化”也包括专业技术知识。中等教育改革中要重视专业技术教育，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人才的需要。

应有人格中的“有纪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

济实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离开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自行其是。遵纪守法，令行禁止，才能更好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没有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就很容易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去打什么“擦边球”。另外应有人格中包含“有纪律”的内容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就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无法提高经济效益。中国长期以来是小农意识占优势的国家，许多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旧中国曾被讥为“一盘散沙”，这是民族的耻辱。增强纪律性，克服国民性格中的弱点，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内容。

现有人格

与理想人格、应有人格相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有人格。现有人格可分为两大类：病态人格和健康人格。

1. 病态人格

病态人格表现为与社会和他人格格不入，对生活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突出地表现为贪婪地追逐金钱，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占有欲，不择手段，礼义廉耻早已置之脑后。80年代初，江西省一些地区出现了一股盗墓的狂潮。有一个农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手挖开了自己母亲的坟，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对金耳环。尽管在挖掘前还烧香、磕头、祷告：“不是为儿的狠心来挖掘你的坟，而是我不挖，别人也会挖。”但这并不能掩盖他贪婪的嘴脸和病态的人格。

病态人格需要矫治，而现有人格要通过应有人格的追求，走向和接近理想人格。而这一切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不断进取，攀登道德阶梯，逐步完善自我得以实现的。既然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那么中国一代新人的人格塑造将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奠定基础。

2. 健康人格

人格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求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格的健康。因此，健康人格成了人类永恒的话题。什么是健康人格呢？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杜·舒尔茨认为：“健康人格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们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健康的人格。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心理学家，一致的意见是很少的。关于健康人格，有足够写满一本小册子的定义。在我们认识的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完成的最好的事情，是研究那些看来是最完善的心理健康的概念，看一看关于我们自身，这些概念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尽管给健康人格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杜·舒尔茨还是列举了7种西方人格理论家关于健康人格的模式，即奥尔波特的“成熟的人”；罗杰斯的“功能完善的人”；弗洛姆的“创造性的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荣格的“个体化的人”；弗兰克的“超越自我的人”；皮尔斯的“此时此刻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人能够而且必须超越其生物本性和环境特征，相信人自身中有扩展、丰富、发展和完善自我的潜能，而这些潜能的实现就成为健康人格。在众多研究健康人格的学者中马斯洛是研究最深入最系统的一位。他提出了心理健康的10条标准：（1）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2）能充分地了解自己，并能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适度的估价；（3）

生活理想切合实际；（4）不脱离周围现实环境；（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6）善于从经验中学习；（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8）能适度地发泄情绪和控制情绪；（9）在符合集体要求的前提下，能有限度地发挥个性；（10）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能恰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这10条标准被许多人认为是健康人格的标志。直接描述健康人格定义的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认为，健康人格是人的良好的行动的方式，这种方式由理智所导引并尊重生活，因此人的需要得以满足，而且人的意识、才智以及热爱自我、自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都将得以发展。从西方人格理论家们对健康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健康人格的主要特点是能保持人格的完整、统一，他们不仅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而且认知、情感、价值、道德、审美等要素整合良好，身心系统经常处于平衡、稳定状态，人格和谐统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实践证明，一个人的人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环境和教育等因素影响下人格可以改变。青年期是人格的第二次重建时期，即人格的再造期。近年来的调查研究表明，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以大学生为例，国家教委对12.6万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大学生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20.23%。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现在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影响未来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抓紧人格塑造的有利时机，促进青年人格的健康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

健康人格的塑造

健康人格的培养塑造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个体通过吸收一定的文化，经过自身主观努力和社会学校教育的影响，使人格逐步健康的过程。在我国深化改革，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培养和塑造健康人格，提高民族素质，其意义更加深远。健康人格不仅仅是个体的成长发展问题，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有一段颇富深意的论述：“个人心理态度、价值观朝现代化改变同时会伴随着行为方面朝现代化改变。这些行为的改变，能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赋予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并持久地支持住国家朝现代化方面的转变。”

人格发展与改变决定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与改变。因此，党和政府应积极面向于培养和塑造具有健康人格和进取开拓意识的社会成员，大力改善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抓起，综合治理，形成一种健康向上，富有生气的社会风气。制订行之有效的公民规范，使人们在合理有序的环境里生活、工作和学习。用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社会成员自觉地向应有人格靠近，让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成为主导社会思潮的大气候，并成为永久的习惯意识。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放后，在对外交往中，我国在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涌进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凭心而论，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都是腐蚀剂，它里面也有民主性的精华和颓废精神垃圾之分。对于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我们务必要积极学习吸收消比。

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末年，中国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积极向西方

学习的结果是带来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动摇了皇权专制观念，导致辛亥革命的发生。随之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把去旧革新推向了辉煌灿烂的顶峰，把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物——马克思主义请进中国，很快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直至伟大坚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所以，学习西方社会的长处，对我们具有作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人格理论的涌入，对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激发中国人的革新创业意识则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开放地有选择有目的地吸取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精华部分，是丰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格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处理问题的优良传统。对于西方文化中颓废腐朽的东西必须坚决予以抵制，防患于未然。鉴于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论”。对任何先进文明的学习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认识过程，渐进地吸取其合理的内核，决不能一次性到位。反过来说，中华文明固然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落后东西，但它里面更有一些富有活力的精神养料，我们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有生机与活力的文明。一句话，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树立长期曲折的辩证思维来对待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这个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由具有健康人格品质的一个民族共同完成，反过来，这个光荣艰巨的劳动过程也是培养塑造健康人格的过程，二者共同向理想的境界迈进。

健康人格的形成离不开认识主体对系统理论的学习。对此，党和政府，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力量要齐心协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应有人格和理想人格的理论建设，大量投资于精神文明建设，大量出版精神修养方面的书籍刊物，组织社会各界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定期学习讨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建树者，及时给予权威性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这样做，其目的在于使全体社会成员对健康人格的理论认识达成共识，形成理论学习的热潮。不仅如此，还应使系统理论的学习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生活实践是培养与塑造健康人格的直接课堂和应用天地。健康人格是社会生活实践对个体社会成员精神素质的要求，是个体人类适应社会的必备素质。健康人格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自发的人格实践经过数代人的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性的智慧结晶，加上人类思维的复杂发达，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以时代特征为准则，提出完美的理想人格标准，以此衡量社会成员人格的高尚与否。人格的这种社会实践性决定了塑造健康人格的主要和直接课堂理所当然是社会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产生塑造健康人格的需求，提供塑造健康人格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使健康人格由抽象的道德教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品格气质；也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提供检验健康人格的场合，显示健康人格的社会价值和力量。因此，我们不仅要号召组织人们学习系统理论，更要倡导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应用、检验和发展每个人的人格修养。教育人们从身边周围的事物出发，留心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向真善美的目标迈进。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留心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也要注意观察身边周围人物的人格表现，鉴别分析其优劣，作为自身人际交往的参考。我们90年代的青年一代，要立足现实，立足自身，放眼全局，放眼世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检验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以健康人格的精神风

貌迎接灿烂光明的 21 世纪的到来。

综上所述，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验，面临的需要克服解决的问题也不少。我们在珍惜现有大好局面的前提下，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外优秀人格理论，吐故纳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健康人格方向奋勇前进，造就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孔繁森精神的人格价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人格是最高的首先标准和最完美的典型，这很容易形成共识。但如果把孔繁森精神与理想人格联系起来，那么人们就会各抒己见，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孔繁森精神的人格价值？这首先应分析孔繁森精神的实质。

孔繁森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繁森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 90 年代。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涌现出大量先进人物。时代塑造了实干家，同时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而孔繁森精神正是当今时代精神的体现。孔繁森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英雄模范人物，他的思想和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发展。

孔繁森精神的产生不仅有客观条件，而且有主观条件。孔繁森同志是在党和政府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干部。他在家乡山东工作时，为人民的事业干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他并不为此满足，从不凭借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当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经济高速发展之际，他身处富庶之乡，但不沉溺于物质享受之中。当党和国家号召安排部分发达地区的优秀干部去支援建设西藏时，他不顾家中的困难，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单位领导安排给他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辞别了老母妻小，辞别家乡，万里迢迢赶赴西藏高原。

为人民服务是孔繁森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他系统深刻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爱党爱国的思想感情上升为满腔热情造福西藏人民的觉悟。孔繁森之所以成为孔繁森，他超越一般干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崇尚实际和不求名利的精神。面对地震后失去家园和亲人的藏族孤儿，他完全不同于某些口口声声为人民，但一遇上麻烦就立即退避三舍的伪君子。当时支配他意识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这几个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孤儿，把他们带回人性的幸福圈子里。能同情孤儿和不幸的人是富于慈善之心，能向孤儿伸出温暖之手的人最具有高尚的人格精神。一般人所孜孜以求的所谓享受在他的心目中被“为他人谋幸福”所占据。孔繁森没有留下多少豪言壮语，但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人民公仆。孔繁森精神的光亮照亮了市场经济大潮中曾经困惑过的人们的前进方向，他向人们展示了创业至上的价值观念。孔繁森人格精神的魅力吸引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们，他的名字跨山越岭，传遍华夏大地，他的英名永载史册。

孔繁森精神的具体表现

孔繁森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贯穿于孔繁森的思想 and 行动之中。他在艰苦地区工作，手中有权却不谋私，为群众利益甘愿受苦受累。孔繁森殉职时，身上的“财产”仅仅是 8.6 元人民币。

孔繁森同志感人的事迹很多，最具特色的是具有复合型领导干部的素质，在他身上既有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 and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焦裕禄精神，又

有新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开拓进取精神。

如果说孔繁森为藏族人民送医送药，抚养孤儿，探望老人可以“感人”，但难以“至深”，因为做一名相当一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胸怀全局抓大事，而孔繁森正是在这一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不管是在拉萨抓普及中小学教育，还是在“世界屋脊”西藏的阿里抓农牧业及开发建设，他都干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他对阿里的地理环境，生产状况了如指掌，东三县牧区怎样，西四县半农半牧区如何，以至于阿里的一草一木都心中有数。他的牺牲就是因为在新疆喀什考察外贸工作途中出车祸所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牺牲前一天，草拟出关于阿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12条建议，好像他已经预料到他将要离去似的。

从广大干部群众对孔繁森精神的理解来看，也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孔繁森精神的实质。在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人们寻找孔繁森式的人民公仆。孔繁森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各行各业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实际上是对当前党和政府部门内部腐败现象的强烈愤慨，渴望党和政府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培养和选拔大批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孔繁森式的好公仆。

就孔繁森精神本身来说，它决不是具体事迹的简单相加，而是蕴含着丰富的人格价值。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孔繁森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思想内容：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但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三大层次，即人类的传统美德、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创造物质财富造福人民的时代精神。人民把孔繁森与当年的焦裕禄并提。焦裕禄是五六十年代的好公仆，为了造福河南兰考县人民，鞠躬尽瘁。有人说，焦裕禄就是孔繁森。我们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又是难以划等号的。就人类的传统美德层次和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而言，焦裕禄与孔繁森确实有许多相同之处，真正发挥公仆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其内在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心是一致的，都值得推崇。这是因为孔繁森精神是人类传统美德和古今中外清官作风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孔繁森身上不同于焦裕禄的时代特征。他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普遍崇拜物质利益的环境条件下能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风格，具有特殊的人格精神价值。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孔繁森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奉献人格的精神榜样，他是不容置疑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在人们功利意识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是否还要提倡孔繁森精神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孔繁森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有同向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实现共同富裕，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而孔繁森精神直接体现着为共同富裕而努力的思想，两者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与孔繁森精神对立起来，以致否定孔繁森精神，这将使市场经济发展偏离正确的方向。

其次，孔繁森精神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孔繁森的名字在中国的今天早已传遍大江南北，孔繁森精神深入人心。倡导孔繁森精神，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有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见利忘义，钱权交换等不正之风；有利于帮助各行各业树立廉洁之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再次，孔繁森精神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关心，一个企业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其内部来说，必须有较强的凝聚力，而感情投资是不可少的。孔繁森对他人的关心胜过关心自己，为了抚养三名藏族孤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卖血。他这种扶贫济困的精神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可贵。多点孔繁森精神、少点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人生信条，人际关系会更加和谐美好。

孔繁森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矛盾及正确处理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孔繁森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有着一定的矛盾。孔繁森精神与讲求功利的市场经济意识具有某些不同的特性。有人把这种差异和矛盾概括为5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报酬意识，这同孔繁森精神无私奉献的品质产生差异；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个体意识，这同孔繁森的高度服从组织纪律产生了差异；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这同孔繁森的克己奉公，与人方便的风格产生了差异；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消费意识，这同孔繁森的艰苦奋斗作风产生了差异；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个体实惠意识，这同孔繁森大公无私的高尚思想境界产生了差异。

对于上述的矛盾和差异，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能过分夸大这些矛盾和差异，以致把孔繁森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否定孔繁森精神。孔繁森精神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过时，当然它需要在新形势下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丰富完善。而从理论视角分析这种矛盾和差异，我们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关系：

制定贯彻经济政策与舆论宣传提倡的关系。前者根据现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形式和大多数人的实际道德水平而制定；而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越现实的水平，鼓励人们向更高的方向前进。这样，两者关系就转换为现有和应有的关系。经济政策的制定立足于“现有”，而孔繁森精神扎根于“应有”。现有与应有处于不同层次，相辅相成。如果依据孔繁森精神制定经济政策，那显然会脱离实际，在实际中难以操作；而没有舆论对孔繁森精神的宣传提倡，许多经济政策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经济政策需要人来贯彻执行，人的思想境界如何，这对贯彻执行有重要影响。因为经济政策不可能对复杂的经济活动都给以具体明确的规定，有人就可能钻政策的空子。学习孔繁森精神，净化人的灵魂，经济政策才能正确地理解，有效地贯彻，而不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当然，学习孔繁森精神是属于宣传倡导的东西，这就蕴含着它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强制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突出了个人利益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肯定个人利益，当三者发生矛盾时，还要作必要的自我牺牲。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意识与孔繁森精神也有吻合之处。孔繁森精神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人利益，而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后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能求他们都像孔繁森那样做到公而忘私，但可以要求他们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向更高方向努力。而对于社会先进分子、共产党员来说，公而忘私的精神应当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学孔繁森要从实际出发，把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才能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弘扬孔繁森精神。

竞争与助人为乐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但这种竞争是建立在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援助的一面。竞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将相互竞争和相互援助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更快发展。另外，竞争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每个侧面的要求。当有人落水时，当有人病重时，需要的是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不是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竞争体现了社会生活中各人或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性，而相互帮助则表明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有相容性，同时助人为乐也是现实人性的需要，人类的美德。竞争与助人为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有其位置，不可替代。

消费意识与艰苦奋斗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个人消费情况而言，人人都不可能像孔繁森一样省吃俭用。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因为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全体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学习孔繁森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应简单地将其消费水平作为生活方式的依据，而是要脚踏实地，不怕苦不怕累地干社会主义。在消费水平上不应盲目攀比，以致超越经济能力进行高消费。提倡艰苦奋斗不是限制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应是使消费沿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消费要建立在劳动创造的基础上，要以经济收入所能容纳的水平为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意识的增强和变化是必然的，而正确理解艰苦奋斗精神才能使两者更好地统一起来。对于青年人来说，更应强调艰苦奋斗精神，这对他们的成长有百利而无一弊。

总之，对于孔繁森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差异和矛盾，我们不能回避，但要沿着尽可能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方面，我们要把握孔繁森精神的实质，在新形势下正确阐发孔繁森精神；另一方面，不要脱离精神文明建设，不要脱离健康的价值取向谈市场经济意识，这样两者的统一就有了基础。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价值，以上论述，实为抛砖引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将会得到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气节

什么是气节

气节，是表示个体行为品性的概念，具有德行主体的积极态度的含义。具体地讲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气节是德行主体为维护人格、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和斗争勇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气节也就是骨气，但“气节”的适用主体稍有差异。“骨气”一般对维护个人人格尊严而言，“气节”是指德行主体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而言。“骨气”是“气节”的基础，“气节”是“骨气”的延伸和升华。

做文章，人们多崇尚“魏晋风骨”；学书法，人们多临摹颜柳体的丰筋多骨；运丹青，人们不以绘出龙虎的头脚须鳞为极致，而是刻意追求龙虎的骨头与精神。为文习字做画尚且如此，做人更应如此。人无骨不立，民族无气节不存。穷不变节，贱不易志，就很好地道出了这种精神。一个人在困窘失意的时候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在地位低下的时候，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就是骨气。骨气作为完美人格的外在体现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堪忍受屈辱，不甘落后，锐意进取。庄子甘为“孤豚”、“牺牛”，甘愿逍遥物外，不愿到楚王膝前为相；屈原不忍亡国之痛，毅然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不论是庄周，还是屈原，他们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汲取，但他们的人格和骨气，却很值得称赞。

骨气作为完美人格的外在体现，其内在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王勃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由此可见，骨气是与志相关联的。而所谓“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志向与坚定的信念。叶挺将军的伟岸身躯不肯从“狗洞子里爬出”，正是出于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宁可倒下去，绝不屈服，正是出于他对民主理想的执著追求；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绝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是出于他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憎恨……

骨气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和出于对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坚定信念，它可以使一个人自立、自主、自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尚的操守。诗仙李白，在身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以浪漫诗人的情调高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心声；宋人周敦颐作《爱莲说》云“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言明自己的操守；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刘禹锡在《学院公体三首》中讲：“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张说在《五君·咏》中盛赞：“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这一切都说明了人格力量的伟大和人们对有骨气者的赞赏。

事实上，每个人在逆境、屈辱和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骨气，常常是与整个民族的尊严、气节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女地质工作者金庆民为了祖国人民的重托、为了中国妇女的尊严、为了南极大陆的开发，她先后三登南极。是她首次发现了南极大陆铁矿石标本，为我们探明南极的矿藏带回了第一手极为珍贵的资料。作为一名女同志，在开始报名参加世界南极探险的时候，懂得她的出征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

的大无畏精神和一个中国女性的骄傲勇敢地加入了南极探险者的行列，并成为人类征服南极的仅有的几个女性之一。她靠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勇气，而是中国人的骨气！号称“亚洲第一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馆的设计者刘振秀，在工期紧，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和外国同行断言“中国没能力设计出这么复杂的建筑”的压力面前，他横下一条心，与他的设计者们仅用了几乎相当于工期定额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座人称“奥运工程之最”的设计和施工任务，而且整个建筑壮美独特，其游泳池长度误差仅为万分之一。国际泳联的一位高级官员参观该馆后称赞说：“这是东方传统建筑风格和 21 世纪建筑水平的完美结合。”刘振秀和他的伙伴们创造的这个奇迹靠的是什么呢？同样靠的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由此看来，个人的骨气往往都与祖国的尊严、民族的气节紧密相联，而“骨气”或“气节”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实，“骨气”或“气节”不过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一个人没有骨气将被世人所唾弃；一个民族没有尊严也终将被世界所抛弃。人无骨不立，民族无气节不存，我们讲骨气，讲气节，因为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我们中华民族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才能实现民族的振兴。我们讲骨气、讲气节，还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铸成了我们强大的凝聚力，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我们讲骨气、讲气节，就因为它是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尊严感并非表现在一时一事上。越王勾践在遭吴兵袭击严重受挫后，为报仇雪恨，他退住会稽山，甘愿为吴王马，卧薪尝胆，终于灭吴雪耻；留侯张良早年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不遂，只身逃亡，备尝艰辛，然而正因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终于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英勇不屈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四十几年的时间就确立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青年朋友们，我们如何做到穷不变节、贱不易志？我们认为首要的是要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 5000 年文明史的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不仅在物质生产上有四大发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具有自己的特质和对世界文明的特殊贡献。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走好强国之路，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讲骨气，就必须批判闭关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魏源讲“师夷长技以制夷”，鲁迅讲“拿来”。我们讲民族气节，并不排除对外国先进文化与技术的学习，“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已经成为中华儿女的心声。我们讲民族气节，还必须批判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味地讲求所谓的“实惠”，为了达到某种卑劣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极力美化西方社会，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视我国 40 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叫嚷中国应该“更换人种”，至少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对这种赤裸裸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做到穷不变节，贱不易志，我们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60年代在中苏关系恶化，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并初步奠定了民族工业的基础。80年代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反制裁的伟大胜利。实践证明，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有能力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中华民族传统气节观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我们谈论气节，就是谈论如何保持气节。保持气节的道德规范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富贵贫穷，如何对待生死福祸，如何对待荣辱功名，如何对待权位爵禄，以及如何待人待己等方面，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处世必以仁德，守身必从大义，为人重在大节，穷达见廉，成仁取义。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所强调的“配义与道、集义所在”的浩然之气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各家在有关气节规范的论述中，从不同方面提出了“立志”、“弘毅”、“德操”、“大行”、“大节”、“节全”等概念，但都是对持节这一规范的具体化的展开。这一道德规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道德精神。当然持节有些思想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如“身死而君安则死之”的封建忠君思想，应该说是持节这一传统规范中的糟粕，应予以批判。

如何对待富贵与贫穷，是检验是否有气节的标尺之一

一个对荣华富贵垂涎三尺，不择手段追求享乐的人，一般来说很难保持气节。这是因为这种人意志薄弱，缺少骨气，忍受不了贫穷的生活，容易在困难面前低头，没有以贫为乐的达观精神，面对困境怨天尤人。抱有这种心态的价值观的人，是不会在困境面前保持气节的。反过来，他们更容易在是非困难的考验面前，见利忘义，出卖良心，亵渎正义。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如陈世美被皇帝女儿所看中，为了得到此等至高无上的荣耀，陈世美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糠糟之妻秦香莲及膝下子女，擢升为御前附马。后来，秦香莲携儿带女进京寻夫，陈世美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不仅拒不相认，反而派人追杀，以绝后患。这起灭绝人性的案子，终被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审判清楚，把陈世美送上断头台。从这个充满生活矛盾的历史故事里表现出两种精神，一种是见利忘义的邪恶小人之心态，另一种精神是包拯不畏皇权，为民伸冤的浩然正气。其褒贬，世人自有公论。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有一位武艺盖世、英俊勇猛的虎将叫吕布，其天资极佳。但吕布这个人没有忍受困难的志气，在实惠的诱惑面前，摇摆不定，最终因反复无常的卑鄙人格而被曹操刘备联军所杀。倘若吕布正确发挥自己的天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克服困难，也许会建立一番功业。其经验教训，世人应引以为诫。南宋时期奸臣秦桧屈服于金人的淫威利诱，不顾民族利益而卖国的丑恶行径千百年来一直遭人唾弃，而且必将遗臭万年。

那么，有没有在富贵面前不动心的人呢？三国时代，曹操为了笼络英勇善战的关羽，给其名马、重金、美女、高官，但这人最重忠义，不为富贵所动；他“封金挂印”，身在曹营心在汉。其最终“千里走单骑”，寻找回归刘皇叔的义举留传为千古佳话，他的行为成为无数忠义之士效仿的榜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不仅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品格风范，它在一般凡夫俗子的身上照样闪烁着其坚强的光芒。古人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警句。蔡文姬虽为一弱女子，却能留胡十八载之久而终归汉。中英鸦片战争时期，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被西洋人打得连魂都差点掉了，正当洋人趾高气扬，到处横行霸道时，却被广州三元里平民百姓迎头痛击，抱头鼠窜，跪地求饶，最后求救于清廷，才免遭灭顶之灾。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士非常重视注意平时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的修

养，以谨慎谦虚勤奋正直的优秀作风养成英勇无畏的浩然正气。正如古圣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必于是。”孔子的言论充分说明了正确对待富贵与贫贱的重大意义，强调保持“安贫乐道”的坚贞气节对品质修养的重要性。

立志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保持气节是善始善终的检验标志

曾子说过：“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乎？”先有安贫乐道的性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实现的吃苦精神，还不足以证明是真正有气节的。太史公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在受了宫刑的残酷打击下，忍着含辱，呕心沥血，以锲而不舍的吃苦精神和惊人的毅力花了19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辉映千秋的巨著。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是苟且偷生，而应该钦佩他这种面对命运而不倒下，不计个人得失，面对困难迎头而上的真正的大丈夫气概。相反，我们应该批判西楚霸王项羽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心态自刎乌江的懦夫之举。项羽的自刎，绝非保全气节的英雄本色，而是自感江郎才尽，不愿坚持战斗的消极懒惰思想。假使他重返江东，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积蓄力量，养精蓄锐，时机一到，卷土重来，那么楚汉争霸孰输孰赢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刘邦集团内部并非没有矛盾，刘邦集团的破绽是很多的。只要项羽留心观察，攻其不备，完全是有可能的。可悲的是，项羽并无百折不挠的韧战精神，轻率的放弃了尚存的机会与希望，其悲壮的结局是必然的。

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具有“志当存高远”的英才们，如陆游为国谋光复中原而征战疆场一生，垂危之际不忘“示儿”：“家祭勿忘告乃翁”。明末抗清义士顾炎武抗清失败，隐居山林，心犹不甘。广搜天下地形民情，著书立说，以观天下欲一旦有变，便赴身光复汉室。他以国家为己任，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心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孙中山先生，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奔走呼号。历经艰难险阻，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奋起，最终成功地领导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在后来的讨袁战争、护法战争中，他继续战斗，直至他生命结束的前夕，应革命政变成功的冯玉祥将军之邀上北京，准备总理国政。可他英年早逝，临危之际仍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留下：“革命尚未成功，诸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孙中山先生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了他图谋建立民富国强统一的新中国的远大志向，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而奋发图强。伟人的事迹，显示了立志追求理想实现的崇高民族气节。我们青年一代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绝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以致用放弃奋斗的方式显示所谓的“勇敢”。“放弃”不是有气节的表现，只能是一种逃避困难的消极行为。我们应该用忍辱负重、立志追求高尚的奋斗目标的坚贞气节开创和建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

达观的生死祸福观念最能体现一个人是否能保持气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来到世上，死是避免不

了的事，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死的方式。荀子言：“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那些品行高尚的圣贤，能够坦然面对生死。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由于利益的争夺和人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出现许多非正常死亡，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谋财害命、人际冲突死亡等等。对于大规模的不可避免的集体死亡，一般人们无法做出选择。最难做出选择的是非正常个体死亡：如作战被俘、犯法受刑、舍己救人、遭人暗算等能亲身体验生死含义的考验。人身上自然属性的本能是避害趋利，苟且偷生。为了活下来，在战斗中临阵逃脱，屠刀面前变节自首，甚至于卖友求荣。但人类是脱胎于动物自然界的万物灵长，拥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思维和理性。无比丰富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日推月移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进化，给人类的行为方式确立了罪恶和正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经过文明的熏陶和自身主观方面的努力修养，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智者圣贤们开始用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存在。这样，保持气节就成了最高尚的品格风范。气节成为支配常人思想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客观地讲，保持气节，就是维护个人尊严，保护民族利益的一种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和高尚行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大多数具有精忠报国的思想意识，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淳朴高尚的，其社会风气是积极向上的，整个国民精神就有一股强大的进取力量，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相反，要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员们，背主弃信，不务实际，沉溺于虚伪腐朽之中；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以身报国的牺牲精神，困难当头，人人只顾自身家小，贪生怕死，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必将走向灭亡。

立足现实，对比今昔，其道理是十分明显的。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莫不是统治者的浮华软弱造成的；反过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经 5000 年的沧桑而愈益焕发光彩，是因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大批为捍卫中华传统而坚贞不屈，与敌血战到底的仁人志士。他们的高风亮节、英勇行为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古人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害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义可也”。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苏武使节团中有人谋害匈奴贵族事败泄漏，匈奴趁机威胁苏武，但苏武不为淫威所屈，理直气壮、声明大义，维护了汉朝的威仪声誉。正因为如此，匈奴更欣赏苏武的勇气，欲诱使苏武投降，却被苏武严词拒绝。为了消磨苏武的意志，匈奴流放他到北海牧羊。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人烟稀少；苏武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地生存着，杖汉节而牧羊，始终不向匈奴屈服；直至 19 载后，在汉朝的坚决斗争下，凯旋而归。苏武视死如归，保持民族气节的英勇义举激励着千万代的华夏儿女。

宋末元初，南宋重臣文天祥，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为国效命，抵抗元兵的侵略。他浴血奋战，顽强不屈。后来在南宋内部奸臣的排挤制肘和强敌的进攻下，退守南疆，仍图恢复。兵败被俘，身遭敌害时，全无惧色，由于他英武神才，气节高尚，被元世祖忽必烈所欣赏，许以丞相之要职，让文天

祥投降。但文天祥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畏生死折磨，坦然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在文天祥看来，生固然可贵，但义更高；为了持节尽忠，牺牲生命是在所不惜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坚贞信念，所以他才能做出气壮山河的义举。可见，真正有气节的君子人物，是能够坦然对待生死福祸的。这种坚贞达观的生死福祸观念，养成了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使他们无所畏惧地为理想立言践行。这些英雄人物，不向邪恶低头，不被困难吓倒；顺境里谦虚谨慎，困境里豪迈乐观，以天下为己任，真正达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一定要学习古代圣贤们的这些优秀品质，用古人乐观勇敢的精神去看待迎接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使我们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自觉防范抵制腐化堕落。困难面前不灰心丧气，困境里不怨天尤人；顾全大局，用豪迈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去面对各种挑战，为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气节修养中如何看待处理荣辱功名，权位爵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是以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为基础的。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结构中阶级、阶层的差别，私有价值观将会长期存在。荣辱功名，权位爵禄只是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私有观念的产物。而人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动物，其精神世界源于物质实践，又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加上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和各种复杂的现实原因，以致对追求财产荣耀权力的社会实践行为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我国历史上，有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造福民众的追求精神；有道家淡泊免得、顺其自然的人生情趣；有佛教中清心寡欲、四大皆空的苦行生活方式；也有市井之中的庸俗小人观念，为了功名权位，不择手段。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存在多种需要，今人马斯洛所研究得出的需要五层次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正确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只有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即较高的功名权位后，才能得到实现和巩固。并且在更深层次上来说，功名权位的具体内容就是人的多种需要。从客观现实来说，名利权位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只有积极适应这种社会现实，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只有这种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奋斗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才能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加上人类社会人与人之关系的复杂；人们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类丑恶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违背了人类向往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所以，古往今来，不少明通事理的君子人物和普通正直之人，对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功名权位的方式极为反感愤慨。古代，在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政治体制极端专制的情况下，绝少有民主的阳光。万民百姓的事务命运皆由天子一人支配，皇帝直接掌握着手下臣民的生杀大权。治理国家的方式虽有礼仪典章的形式，但决策执行的核心权力由着君主的脾气好恶，所谓国家大事也是为君主一人服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君主贤明，国势就强盛；统治者昏庸，就有改朝换代的结

局。倘若君主明智，在用人方面就可以亲贤臣，远小人；通过正当渠道选拔官吏，功名权位就可以成为正当光荣的事业而为人们所称道。反之，如君主昏庸腐朽，便会出现小人得志，忠良受排挤的现象；高官厚禄落入奸邪小人之手，市井利欲熏心之徒为追求享乐对功名权位垂涎三尺，不择手段孜孜以求之。这些名利之徒，一朝职权在手，便肆无忌惮，欺下瞒上，鱼肉百姓，亵渎正义。功名权位失去了发挥正当社会职能的作用，功名的价值在正直人士的心目中成了罪恶的主要根源。甚至于有人远离名利，隐居山林，与世无争，如东晋名士陶渊明归园田居，怡然自得，获历代淡泊功名隐士之冠。这些人其中也难免有一部分人，本意热衷功名，但仕途屡屡受挫，便悲观厌世，产生了愤世嫉俗的心态。所以，古人视淡泊名利为保持气节的观念既有其合理的内含，也有迂腐的糊涂观念。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名利权位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在权力功能的影响下对社会产生或坏或好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我们应该在分析借鉴历史的基础上，为现实提供合理的科学认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用人唯亲，贪污腐化的政治现象是必然的。而封建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亲亲、尊尊的特权思想，正义和真理没有真正的市场。他们所有的知识并不是为民众利益服务，而是为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集团服务。由于封建知识分子主流的信仰与道德追求从本质上来说缺少群众基础和现实科学性，所以他们的气节修养就缺乏现实的操作性，最大程度上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信条和极个别的精神修养准则。再说，封建君主除了开国皇帝是凭其实在本领登上宝座外，一般的都是靠血缘关系世袭产生的，是宫廷矛盾斗争的产物，没有依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推选的制度和传统。这些自幼在宫廷深院中长大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社会实践的磨练，缺少处理各种事务的政治才能；也就更谈不上用人唯贤，知人善任。礼教中的仁义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标准只是对皇帝的理想要求，并无实际上的约束力。皇帝尚且如此，则他手下的为功名权位的朝廷的文武大臣又怎能普遍持久地保持气节呢？那些仕途失意的知识分子由失望变为愤世嫉俗，向往隐居山林，只能是吃不到葡萄后的一种心理变态而已。当然，也有真正淡泊名利之士，但也只是凤毛麟角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赞扬那些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的卑鄙行为。这种人，有朝一日一旦头戴乌纱帽，就会原形毕露，从民众身上捞回自己的投资，做出种种祸国殃民的事。对这样对待权位功名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抛弃。不要说今人，就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对这样的人和事也嗤之以鼻，甚至直接予以打击制裁。北宋时期有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专门惩治做奸犯科，无恶不作之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身正气，不畏权贵，为民请命，谱写了封建时代正气之歌。可见，尽管时代在变迁，但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继承贯通性，即正义的价值是永恒的。

我们在批判否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追求功名权位的价值观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那些把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追求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力图建功立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高尚的名利观。具有正当高尚名利观的人，他们本身的高尚持久的信念和奋斗的历程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且他们的业绩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西汉时期，戍边名将李广，身经百战、保家卫国、出生入死，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李广本人凭其显赫战功受封为侯，满足他

最高人生价值的实现。李广虽然壮志未酬、受屈自刎，但我们决不能抹杀他戍边卫国的英雄业绩和通过正道追求功绩权位的光明磊落的胸怀。李广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虽然有一些封建性的官本位因素，但他更看重的是用显赫的功绩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这种追求功名的方式不是用投机钻营的不正当手段，而是靠报效国家，流血流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广的功名权位观念是高尚正当的，其合理的内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他一生奔波，历尽艰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耗尽心血，几度出任革命政府元首，但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孙中山先生有图谋权位的野心。他的所作所为，理想信念是建立在为民众谋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民族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中，不仅有践行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帝王将相，更有崇尚气节的贤达君子，他们注重从理论和内心信念上澄清对荣辱功名、权位爵禄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功名取之正道，有益于国家人民，则受命而谋其政；若功名有侮正义，有损于国家民众，则须舍弃功名而取义。贤君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该洁身自好。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华人专家学者，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冲破层层阻挠，毅然回国效命。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图享受，追求正义的生动体现。

保持气节的思想基础

对待自己与他人，家庭与国家的态度观念是能否保持气节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最能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如在关键时刻，不能维护公共利益；而是采取明哲保身，退避妥协的态度，有时甚至于出卖良心，那么，这个人就缺乏持节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尤其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上形形色色忠奸善恶的脸谱：有高洁、有卑劣、有英勇、有怯懦，把人性的善恶美丑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图谋利益，这本身是正当的。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应遵循社会秩序规范，不应损害他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再说，助人为乐也是人性的传统美德，为他人谋幸福是人生幸福的一部分。每个人应当正确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力求保持创造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产物，一个人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群体里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离开集体社会的进步，单个人是谈不上任何发展的。一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个人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单个的人要想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集体，必须维护公共利益，顾全大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人类社会和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历代古今中外那些目光远大富有奉献精神的人们奋斗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大禹公而忘私的治水精神，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可能要延迟创造时间；若没有刘福通揭竿而起推翻元王朝，汉民族也许会逐步走向衰落；若没有全民族的奋起抗日，中华民族可能已经灭亡。从世界范围来说，若没有哥伦布的航海，没有瓦特的蒸汽机，人类至今还可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总之，是那些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们，创造着新的文明，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今天的人们都学习那些优秀前辈的奉献精神，脚

踏实地，力争创造，那么人类的今天会更美好，明天会更灿烂。

但由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些唯利是图，忘恩负义之人，腐蚀着人类群体的道德思想，污染着社会风气。俗话说得好：“学好需三年，学坏只三天”。这足以说明提高道德品质修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卑鄙者的丑恶行径不仅直接造成了对社会的损害，还严重地影响着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容易使一些原本正直善良的人在污浊风气的冲击下迷失品质修养的方向，甚至变得圆滑世故。这就说明，保持气节是一项不容易的心灵塑造工程。一个人如果从内心深处冲破不了私心杂念的界限，则他就很难在道德上保持和发展，做到善始善终。要在对待公与私，家与国的认识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思想境界，需要一个长期反复的学习和修养过程，使自己与人为善，天下为公的信仰由表面的认识转为真正的内心信念。那些具有助人为乐、先人后己思想的人，一般就具备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具有忠孝不能两全，舍家报国的信念；具备了为公而甘愿牺牲自身利益的浩然正气，能够经得起生死困难的考验。这些道理不光是今人的认识，在我们之前的历代仁人志士早已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光辉的典范。他们舍己为人，舍家报国的无私精神表现在不同方面。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言，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胸怀天下，爱国爱民的精神。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屈原虽遭放逐，仍“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一心“存君兴国”；陆游盼望国家统一，临终抱恨遗言，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精神即把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无比关心。他们忧国忧民的襟怀至今仍激励着亿万人民为国家振兴、民族腾飞而努力奋斗，积极奉献。以身报国，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精忠报国，一生征战；邓世昌血战日舰，殉难黄海，久已为人民传诵。今天我们更要继承这种传统，报效社会主义祖国，把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犯、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抗暴御侮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林则徐虎门烧鸦片，三元里人民抗英，翠云娘“红灯”照民魂。他们义无反顾，奋起抗击的事迹，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甘受侮，在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有的公忠为国，清正廉明。公忠为国，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秉公执法，顾全大局，反对徇私枉法和以权谋私，不以私情害公利，是传统道德中的一个优秀部分；廉洁奉公，反贪拒贪拒贿是它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中国有为的政治家就提倡，为官当政要立公去私，认为是公还是私，这“公私之交”是“存亡之本”。大公无私，成为一个优良传统。子文秉公执法，不私亲故；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都表现了无私的精神。蔣相如不以私人意气与廉颇争高下，表现了以大局为重、不以私情害公利的高尚风格。在这些事迹中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应该得到提倡和发扬。反贪倡廉，是立公去私的一个重要方面。子罕以廉为宝，梁寅以“清、慎、勤”为居官三字符。这些古人的言行，在反腐倡廉的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这些方面，能做到扬善去恶，持正除邪的人，都已具备了坚贞的骨气和高尚的气节。

以上论述中，对于什么是气节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对气节的认识和具体

表现做了一些简要的分析。正是这些英烈先贤们的满身浩然正气，谱写着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光辉历程，迎来了今天的幸福日子。维护人格、民族的尊严和权益，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挠，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奋发图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方社会的气节观

气节，这个高尚而珍贵的精神修养名词，不仅在东方文化古国——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它还深深植根于世界各民族精神之中。西方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它们的气节观对我们就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不仅如此，还由于欧美西方社会文明的先进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广泛深刻地认识学习借鉴和通融它们气节观与中华民族的气节观的比较和交流，才能使中华文明的价值观走向世界，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目前，我们认识西方世界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为科学真理献身的布鲁诺，为个性解放奋斗不息的雪莱，为自由而战的裴多斐……所以在不少思想激进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眼中，西方欧美人士几乎个个都是为理想为个性而奋斗的杰出人物。当然，事情并不都是这样，西方人中也相有数量的及时享乐主义者。但西方社会确有为真理而献身，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传统，并且这种传统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土壤之中的。西方社会也有他们的气节观，但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与中华气节观有较大的差异。由于将近四五百年来的工业文明的洗礼，西方社会从思想观念上已走出了特权等级的樊笼，从精神上基本实现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人性革命的成功。所以西方的气节观更注重个人权利，人格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他们绝少为统治者和顶头上司的利益而上刀山下火海的牺牲精神，强调的是为真理和正义挺身而出。西方社会的气节观的形成离不开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内核。因此西方社会的气节观的内容从维护个人权利出发，并且要求这一高尚的性情修养方面人人平等，即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统一的。西方社会气节观现在给我们的印象是大致如此，但探根溯源，它伴随欧洲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古希腊文明时代；二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时代；三是文艺复兴开始直至今日。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明历史发展阶段，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

古希腊时期，其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辉煌。古希腊社会实行奴隶主贵族民主政治，那一缕民主的阳光催开了人们思维的百花齐放。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不是为霸主尽忠献策，而是探究科学理性的客观规律，力图靠近真理。从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到亚里斯多德的博大精深，对人自身和外在世界的本质进行了认真深刻的探求思考，显示了古希腊尊重科学，向往真理的优秀品质。有了这样的人文背景，他们关于“气节”的认识就倾向于捍卫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存在和真理的价值。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他们直接鲜明地提出为自由而战，而没有中国人以忠君的真心实意迂回曲折地表达维护民族生存权的痛苦心理。但他们与敌战斗到底的勇气决不亚于中国人，在抵抗波斯王大流士入侵的战争中，斯巴达 300 壮士壮烈殉国的义举不仅捍卫了古希腊人民的自由，而且为欧洲人树起了一面为自由而战的光辉旗帜。古希腊人高尚的民族气节，逾越几千年历史，远涉重洋，在现代工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飘进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

公元纪年几个世纪之后，从北欧南下西进的日耳曼蛮族摧毁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填补了日耳曼蛮族简单的精神需求。就这样，历史的巧合把欧洲带进基督教神学支配一切思想意识的中世纪，把原来的民族文化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中世纪的基督教，以禁欲主义，压制个性精神

自由而闻名于世。它排斥基督教神学体系以外的一切思想学说，把与神学相异的思想意识诬之为异端而加以残酷迫害。在这种宗教专制统治下，“气节”被理解为宗教教义的绝对虔诚和为之献身的精神。基督教的创始人，“救世主”耶稣本身就是基督教史上殉难的第一人。耶稣的殉道义举震撼了欧洲人的心灵，成为他们效仿的光辉典范。严守教义，效忠教会成为保持气节的标准。能否对教会神父的意志绝对服从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水准，信仰上帝是基督教徒的至高信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历史上有名的持续 200 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号召基督徒们从异教徒手中夺回“救世主”耶稣基督殉难的圣地耶路撒冷，为信仰殉道。“殉道”成了“气节”的代名词，叛教为最卑鄙的行为。欧洲人的这种信仰和做法是否正确，是个历史的和没有结论的话题。我们也不宜以今天的眼光和中国人的思维妄下结论，我们应该做的应是吸取其中对我们有用的合理的东西。基督徒的这种宗教狂热信仰的产生与发展是客观历史的产物，它不仅支配了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命运，而且对近代世界历史命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神话是终究会被打破的。环球航行，新大陆的发现推翻了许多先前圣贤的结论，古希腊文明的重新发现极大地冲击着罗马天主教神学对人性精神意志的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急剧地刺激着人们世俗追求的萌发，一场震撼人类命运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人们发现除天主教神学体系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新奇事物。原来的许多传统的经典性结论被后人证明与事实不相符合；新兴的资产阶级酝酿着追求财富、追求享乐、人性解放的强烈欲望；一场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呼啸而起。科学思想冲破了宗教神学的禁锢，禁欲主义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理性至上，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潮上升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那些在中世纪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诸如墨守成规，听天由命等思想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气节”概念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尊重科学，崇尚真理是人们的精神特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真理和科学事业献身精神是欧洲人所推崇的高尚气节的标准。法国作家雨果用饱含深情的笔墨书写善良渺小人物不幸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名著里，他满怀正义感责任心强烈地呼吁人道主义精神；并且认为只有真正发扬人道主义，社会上才能实现正义，消除不幸。我们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等级观念相比，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科学家伽利略不畏传统势力和思想的阻挠与冷嘲热讽，勇敢地向古圣亚里斯多德的有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结论挑战，成功地证明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科学事实，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使尊重科学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阐明人的本性，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倡导人道主义，不惜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向庸俗的邪恶势力妥协，写下了千古佳作《爱弥尔》和《忏悔录》，表现出一个正义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和应有的气节。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斐渴望自由，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在国难当头之际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最终用以身殉国的义举来践行自己的信念，充分显示了坚不可摧的骨气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早已传遍五洲四海，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气节”观念没有停留在固守正义、追求真理上面。他们更进一层地把气节的内涵推向一个动态的新阶段：那就是勇于冒

险，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找到通往东方的另一条海上通道，他们前赴后继地进行航海冒险，许许多多的探险者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数勇敢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世界的另一半——新大陆。这一重大的地理发现决不是一群猎奇者的意外巧遇，它是“地圆说”、航海技术和欧洲人的冒险精神的结晶，是一次真正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欧洲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发现新大陆之后，不以美洲大陆的原始落后而掉头离去，他们本着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对这块广袤的大陆开始了仔细深刻的了解，发现了美洲大陆富饶的资源 and 美丽肥沃的土地。在冒险家成功事迹的启示下，一批又批西欧白人怀着对黄金的梦想，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陆，寻求新的生活，开辟新事业。西欧白人不仅是开发美洲大陆的主力军，而且还是一群残酷无情的刽子手：他们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意识野蛮地屠杀美洲大陆的原始主人——印第安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血泪斑斑的一页。从此，欧洲人的“气节”等道德品质范畴打上了种族主义的深深烙印。他们把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人的罪恶手段看成是获取利益和幸福的正当事业。那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在白人眼里是勇敢的开路先锋。这些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恶，不幸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只能从内心深处做一番褒贬，但无法改写历史事实。不管怎么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发而发迹的欧洲人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打上了功利主义的烙印。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领先于全球的欧美工业文明，以其锐不可挡之势，扫遍了全球，其科学、民主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人性，激发了人们无穷的创造力。新的工业文明推动社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逐步显示出其无比先进的优越性。但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弱肉强食，功利主义至上。中世纪的忠教殉道精神已被讥为迂腐愚昧。欧美两大社会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追求个人功利的成员的结合体，一切价值观念都渗入了深深的功利因素，“气节”这一品质修养范畴也不例外。为捍卫个人权利和利益坚贞不屈，出生入死，积极进取的精神被誉之为美德。欧洲白人在全球的进攻，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益膨胀，欧美白种人的气节观念中不可避免地渗进了狭隘的种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不在于维护种族尊严，而在于强调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压迫，维护白种人血统的纯洁。为白种人的侵略扩张事业做出贡献，做牺牲的人被誉之为有气节。

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当资本主义从大规模上升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后，原始资本主义赤裸裸的血腥面目逐渐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竞争的胜利者享乐幸福，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现实的需要要求现有社会成员具备一定标准的综合素质，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成为资产者约束人们行为的有力的精神武器。泛人道主义出笼了。是否讲人道主义，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试金石。能够为民主、法制、人道主义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就是具备了高尚气节的人。华盛顿将军为北美大陆的独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自由女神的化身。林肯总统为解放黑奴，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前进的障碍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是，林肯便成为捍卫民主与自由的斗士，具有为人权而战斗的气节。爱因斯坦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物理科学，终于创立了相对论。他不畏世俗的嘲笑和来自科学界的传统权威的压力，勇敢地坚持和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开辟了自然科学领域新的革命道路。爱因斯坦在维护和坚持科学真理面前表现出了高尚的气节。这些人物，不论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还是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对本民族的利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且对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起了巨大作用，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气节观扎根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功利主义等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其表现形式是发扬人道主义，维护人权，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是西方社会的气节。当然，欧美西方社会的气节观明显地表现出其阶级性和种族主义的局限性。对于这些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有鉴别地批判吸收。维护人格尊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等其实质内容方面，中西社会又有本质上的相同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西方社会的气节观植根于现代生产关系的现实之上，比之我国传统的气节观来说，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更易于做到。

除上述社会客观现实原因之外，我们应认识到“气节”这一品质修养范畴最终是由认识主体——人，去遵循实践的。这就涉及到真正懂得理解“气节”内涵的社会成员数量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西方社会，中世纪时，由教会神父向全体教徒宣讲传播宗教教义，普通民众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神学体系内的是非善恶，一般都有一点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到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在西方社会很成功，义务教育成为社会常规。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普及与提高，对认识理解较高层次的道德修养内涵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并且容易在某些方面达到共识，其社会效果是相当良好的。这也是西方社会人们道德水准较高、社会效益良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这种文化传统遵循了“先理解，后选择”的科学规律，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人口的集中，为经常流通，共同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公众在剧院晚会，广场集会等群众性活动场合，容易集思广益，明辨是非；可以做出颂扬正义美德，谴责罪恶的决定，对净化社会风气起到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人们对“气节”等品质修养方面的要求容易明确认识，并且有系统规范的理论舆论的监督。相比之下，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古国——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结构维系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但在精神意识上历来缺乏全民性的教育机制，文化教育掌握在少数地主阶级手里，给予广大劳动人民的则是愚民政策和精神统治。所以古代中国的主体民众缺少文化教育，更缺乏对“道德系统”的理论认识。对于是非善恶只能凭自己的直觉和特权阶层的指挥棒，而没有全社会普遍的准则。就这样，在道德的天平上，古代中国人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痛苦地滑来滑去。上层知识分子自诩君子，坐而论道，道貌岸然，口是心非；下层民众为小人，小人也有区分。大部分小人，愚昧麻木，唯命是从；一部分小人唯利是图，毫无道德可言。正人君子之流的气节观与村夫野老的气节观有时大相径庭，差异之大，令人惊叹。整个社会没有达成上下一致的共识，士大夫们所谓的气节观在普通民众中找不到市场。即便有村夫野老对知识分子的高深道理顶礼膜拜，但也不知其所以然。其结果是：士大夫们推崇的抽象的气节，不要说一般民众做不到，也不容易做；就连士大夫自己也做不到，只是流于清淡。真正嫉恶如仇，取义成仁的英雄气概只是少数耿直人的行为，这也许是历代王朝兴衰的一个原因。可见，中国传统的气节观虽有崇高的理想色彩，但缺乏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操作性，脱离了一般人的思想实际。这种状况的出现和持续，根源于小而全封闭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的封建统治；也跟封建知识分子注重名利，崇尚清淡，不务实际的作风有关。从另一方面来说，普及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对于培养民族气节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以上通过对西方社会气节观形成的社会环境做一简要分析，我们就可以明了各自的侧重点和优劣，从而有选择地进行借鉴、批判、继承和创新。

当代中国气节观的现状与走向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经济、政治、思想解放运动。它涉及的面积之广，影响之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使原来习惯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它不仅调整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经济政治人际关系，还引进了久违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新东西——新科技、新产品、新管理、新文化、新思潮……这一系列原先不曾熟悉的洋货，确实让久闭门户的中国人眼花缭乱，致使许多青少年盲目模仿，步入歧途。

这样的新形势下，不仅使共产主义革命人生观受到了激进分子的怀疑和否定，连已被批判过的传统文化也再次被挖出来，横遭剖析否定。一股主张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开来。直到苏晓康的《河殇》，这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长城是死城，黄河成了孕育黄色文明的罪魁祸首。作者深情地呼吁国人向西方海洋文明伸出橄榄枝，脱亚入欧。苏晓康先生为古代中国人没有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与帕米尔高原这天然屏障而走向蓝色的海洋文明深感遗憾。苏先生视由黄河泛滥而冲积成的黄土地上发育而成的黄色文明为阻碍民族进步的负担和精神桎梏。至此，对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的崇拜的社会思潮，在中国达到极至。

这种社会心态把中国人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容易偏激的中国人从先前的盲目排外转向了主张“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一部分自诩为“文化精英”的人大有想一夜间把传统文化付之一炬的架势。崇洋媚外之风在社会上越刮越紧，那种中国传统的民族气节遭到非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有些浅薄的人甚至妄说什么“林则徐虎门销烟”是拒绝西方文明的洗礼，近代中国的衰落由林则徐引起，真是愚蠢之极。他们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根源是由英法帝国主义掠夺侵略欲望所致的，更不懂得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造成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在这些西化分子眼里是迂腐罪恶的表现。不仅如此，甚而有人美化日军侵华战争，胡说什么日军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溃进程；却无视几千万在战争中的死难者和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真是“温室里长大的花草不知旷野里风吹雨打的折磨”。依崇洋媚外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将鲜血洒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士倒是一群不懂先进文明价值的莽夫。

在这股逆流的冲击下，忠烈成了愚昧，贪生怕死的卖国汉奸倒成了识时务者的俊杰。不是吗？时下，不是有一批人正在力图为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大搞翻案运动，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烈士却受到非难，被某些人讥之为“傻冒”。“民族气节”这个神圣的名誉受到了亵渎，邪恶意欲压倒正义。高尚、优秀的东西找不到市场，无人问津；唯利是图，屈服于淫威，崇洋媚外成了一种时尚。买商品要洋货，文化产品也是国外的刺激。如果遇是洋人，立即露出灿烂笑脸，殷勤之极。对洋人，可以献出一切。市井小民，可以为洋人卖力；政界、工商界要员可以出卖国家利益、国有资产；文化艺术界，女人们争先恐后向洋男士奉献爱情，力争博得洋男士的一笑……有首民谣唱道：“十八九岁的哥们听听，现在最流行什么；不是那西北风，也不是那东南风；是出国留学热……”还有首歌唱：“跟着老外走，老外的钞票多……”为了出国赶时髦，芳龄二十出头的倩女可以嫁给国外七八十岁的洋老头，还自觉是攀龙附凤。人格尊严，民族气节，被大洋彼岸刮过来的

洋风吹得东倒西歪。

西化分子的灵魂沉浸在茫茫的蓝色海洋文明里，分不清东南西北。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一厢情愿总有梦幻破灭的时候。一朝醒来，虔诚的西化分子们恍然发现，他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的西方洋人，并不欢迎这些没头没脑的盲目追随者。当洋人们的各种欲望满足之后，便把利用过的人化工具无情地抛弃一边，而无任何感动恻隐之心。梦醒之后，信徒们无所适从，空虚至极，最后只好厚颜无耻地回到被自己嫌弃过的母亲身边……虽然，事情并不都是这样，但逆流泛滥的现象确实曾相当严重。

淌过河的、隔岸观望者、随波逐流者等等，经过轰轰烈烈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和洗礼后，开始自觉有意识地分析中西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异同优劣，逐渐悟出中国社会的现状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造成的；而且社会制度的改革完善绝不能再来一次“大跃进”，只能有限度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较重、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口众多国民经济底子薄的国家，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发展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是珍惜巩固现已取得的成果，立足现实，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不是搞什么破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励之之流所主张的：“中国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再发生几次长时期大规模的动乱，中国再当西方发达国家的三百年殖民地”等荒唐透顶的卖国言论，已经被人们识破其阴险的真面目了。其甘当洋奴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当一部分中国人，踏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后，经历了种种事情，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的价值。弱国无外交，穷国无地位。只有祖国的富强统一，才能提高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才能享有充分的人格尊严。当然，我们不能等到祖国富强的那一天，才维护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我们应从身边做起，在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一场合，时时处处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把维护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的高尚行为，化为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社会工程。

《读者》杂志 97 年第 1 期刊载了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遭人侮辱后历经艰辛讨回尊严的事迹，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启迪性。这位女留学生为每月 300 美元的薪水受雇给一位美国老太太做仆人，负责照料老太太的日常生活。不料这位美国老太太年岁虽大，但心眼却很坏。她极端歧视中国人，不允许这位女留学生起高雅的英文名字，强行叫女学生为“摇铃”，意思是女留学生是为她看门的狗。这位女孩尚且能忍耐，但美国老太太得寸进尺。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一样，利用合同契约中由雇方供给一日三餐的规定，百般刁难中国女留学生。不允许她自己买饭吃，只能吃她准备好的给她家畜吃的剩饭，以满足她的虐待心理。敢问美国人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在哪里？这位女留学生实在忍受不了，提出辞职。但美国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不同意，发生争吵。这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竟然拳脚相加，向这位身在异国他乡的弱女子大施淫威，其手段之狠毒，令人心寒。可怜这位中国女留学生被打得身体致残。而这起恶性伤人案，美国法院竟置之不理。可见，美国的法制是何等的虚伪。为了洗清自己的冤情，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下，这位女留学生横下一条心，决心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讨回公道。从此，她开始了四年之久的上诉。期间，她半工半读，苦修美国法律，寻找维护自己人身权利的法律条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之后，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

冲破层层阻挠，这位女留学生终于将打人凶手送上审判台。大庭广众之下，原告要求被告大声向听众说明他犯下的可耻罪行，并向女留学生公开道歉，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打人凶手最终被迫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胜诉之后，这位姑娘撕碎了被告赔偿给她的5000多元美金，义正词严地宣布：她这四年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争回做人的“尊严”。“尊严”，多么神圣的字眼啊！它在一切自尊自爱的人的心目中有多么重的份量啊！这位姑娘为维护人格尊严而表现出的坚贞气节，显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慑服了那些自高自大的伪君子。

事实不断地对“绿卡族”的灵魂进行洗礼，使“绿卡族”成员们从崇洋媚外中清醒过来，逐渐体会到了独立自主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中国之父毛泽东先生一贯主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良苦用心被人们从更深层次上所理解领会。一个不讲民族气节的民族绝不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应是条件成熟论者，要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时时处处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这方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树立了无数的光辉典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这一高尚神圣行为的继承和发扬。

“气节”修养和保持不仅适用于对外交往，它同样适用于国内日常生活当中。古时候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有诗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豪迈精神。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官本位”、“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等各种丑恶现实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人，一些贪图功名享受之徒，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算尽心计，百般讨好顶头上司，形成一股不小的媚上欺下的歪风，严重地污染着社会风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少官员抵制不住铺天盖地而来的糖衣炮弹的袭击，糊里糊涂地当了金钱的俘虏，由人民的公仆蜕化变质为地地道道的官僚分子。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时，不以党性原则出发来看待处理各种问题，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徇私舞弊，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在当前这种风气不正的社会形势下，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当中需要不需要维护人格尊严、保持气节？近年来，人们在盛赞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势头的同时，无不为社会道德水准滑坡而深感担忧。没有精神文明支撑的物质文明是不会持久的，犹如历代封建王朝频繁更替一样。没有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很难保持长期稳定。而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的保持完善有待于民主法制的建设和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如果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缺乏民主法制，就不会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规范机制；如果广大党员干部不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那么党和政府就会降低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如果一般人民群众缺乏与官僚作风做斗争的勇气，热衷于溜须拍马，那么这种心态和做法容易给官僚主义提供广阔的市场。因此，自觉地维护人格尊严、保持气节，不仅是党和政府、国家干部的责任，而且也是对广大群众的道德品质修养的要求。

当前形势下，那些甘愿丧失人格尊严，甘愿做精神奴隶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人是那些一门心思投机钻营，为了博得上司的赏识，挖空心思，甘愿忍受各种委屈，以求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二种人是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奴性心理，屈服于特权等级观念，乐于甘为人下；第三种人是那些明知媚上欺下作风的实质危害，但为明哲保身，只好随波逐流。以上三类情况中，危害性最大的是第二种人的思想观念，即乐于为人奴隶的心态；把官员尊长违反原则办事的做法行为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人认为顶

头上司永远是对的，即使上级的行为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公共利益，也应该谅解。这种观念的残存，使部分身居领导岗位的投机分子贪脏枉法，无所顾忌，极大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改造普通群众的思想观念，教育号召全社会共同在金钱权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应有的气节，坚持原则，敢于同官僚作风等不良习气做斗争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在当前思想意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偶尔出现人们一两次勇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英雄事迹，犹如炎夏里吹来了一股清风。

官场上如此，商海中是否就遵循自由公平的竞争原则呢？答曰：非也。在我国，从以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许多不法分子利用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出现的漏洞和不完善，钻政策的空子，行贿受贿，大搞权钱交易，吞食国有资产。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手中握有特权的官员及高干弟子，利用手中的特权和关系网，大搞官倒，囤积居奇，投机取巧，巧取豪夺，形似民国年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暴掠国民财富。这种情况虽非时代的主旋律，但也忽视不得。官倒和权钱交易，犹如腐蚀剂，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育。它对市场经济道德造成的危害是破坏了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错觉。商潮滚滚，泥沙俱下，“一切向钱看”似乎成了劳资双方的共同价值取向，而忘了道德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赚钱，老板们不择手段，而不问是正还是邪；劳工们为了生计、为了诱人的薪水，也不管老板是谁，是否合法经营，只要能付工资就行。真正灵验了“有奶便是娘”的功利原则。现在的劳工，为了挣到那份血汗钱，可以忍受老板的种种苛刻要求和无人道的待遇。这方面，是否维护人格尊严和气节成了人们争议的一个话题。这里有一则这方面的事例，颇耐人寻味。

96岁末，全国几家大报刊载了一个有关劳资纠纷的案例，原委是这样：“南中国的商都广州，一家韩国公司女老板，为了惩罚迟到的中方雇员，竟令中方雇员向她集体下跪，以满足她的虐待淫威心理。大多数中方雇员为了一份有限的薪水，做出了牺牲人格的尊严和民族气节而向恶人下跪的选择。这当中，只有一名从河南来的打工青年，毅然做出了辞职不跪的义举，令韩国女老板目瞪口呆，淫威之心顿减。这位河南打工青年的行动受到了所有知情者的高度称赞。很快，另一家中国公司破格录用了这位铮铮硬骨的男子汉。”当全国各地的报纸转载了这一消息后，人们无不为一位河南打工青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勇气所感动，更欣赏他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寻求更广阔的生活天地的开阔的胸怀。这位打工青年敢于牺牲财富，珍惜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的高尚精神犹如是茫茫夜空中的一道亮光，划破了沉溺于钱眼之中的中国人的扭曲了的思想观念。他的高尚品格散发出的光彩辉映出那些为一份工资甘愿忍受侮辱的雇员们的怯懦灵魂。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容易失去做人的尊严；一个缺乏气节的民族，只能是一群没有凝聚力的乌合之众。我们不能盲目仇外，但也不能崇洋媚外，俯首认命。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目的有选择的，不是要投进洋人的怀抱，也不是要跟在洋人的后面邯郸学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吸取别人的长处，扬长避短，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70年代末以来的这场社会转型的巨大历史变动时期，我国社会各界对“气节”内涵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我们不应为目前社会上存在道德滑坡现象而悲观失望，也不能因时代的主旋律是健康

向上的而忽视社会上那些丑恶事物对民族精神的腐蚀。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地驶向 21 世纪,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历程中中华民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气节观。它虽并不十分成熟,但其清晰坚强的轮廓有形可辨,这就是注重提高自身素质,积极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气节观的培养和塑造

气节，做为为人处世的较高的道德修养水平要求，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高尚的气节风范更是完美人性的标志之一。那么，我们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怎样培养和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高尚气节的一代新人呢？这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历史性任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应从全局的、整体的、长远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具体地来说，我们应从优化社会环境、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教育引导认识主体、加强主观修养等方面来实施进行这项复杂而宏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程。

优化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向人们提出“气节修养”的客观市场，也是人们最终践行其“气节修养”的用武之地。人之所以要加强“气节修养”，就是为了使自己适应社会，并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气节观，社会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气节”的认识和践行。因此，我们社会主管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机关部门，必须花大力气改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的方面很多，主要的是民主政治的建设、法制的完善、廉政建设、清除精神污染、教育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只要这些直接涉及每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利益的根本性的关系顺了，那么，社会上绝大多数公民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和建设性意见得到充分尊重。诚如此，则民心必将振奋，会出现群策群力共建现代化的健康积极的潮流，形成人心不倦的良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制度大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人们的道德思想水平必然随着进步；人们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也将逐步得到满足和尊重。良好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必将注重自身思想道德的修养，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和保持坚贞的气节。维护人格尊严和保持气节将会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优良的社会环境则为人们践行这一高尚的精神修养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天地，并且不断促进人们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

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规范化的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宣传教育，人们的道德修养思想认识不会达到广泛明确深刻持久一致的效果。人非生而知之，后天教育对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国家主管宣传教育的部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千万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放任自流，自由散漫，是导致思想认识混乱，精神堕落，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温床。我们的宣传教育的舆论导向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认识，提高觉悟，深入群众，脚踏实地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这就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准确、实在、及时，确实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客观准确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报道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真实现状和走向，使新闻宣传工作成为沟通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只有这样，才能

使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能站得住脚，才能使宣传教育工作显得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除了要坚持上述原则性的态度问题外，还必须注意工作方法。宣传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真正的疾苦呼声，有勇气支持宣传正义，抨击邪恶；使各行各业普通大众的心声能真正居社会思潮的主导地位，使新闻宣传工作起到应有的效果。现实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走出办公室，走出机关，深入工厂农村基层，进行广泛深刻的调查研究，避免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主义作风。只有扎实勤奋的工作，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才能被人民群众认可接受；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转向健康的轨道上来。实现了这一转变，正义和邪恶，真诚和虚伪就自然会泾渭分明，人们的价值观念自然会朝着真善美的方向转化。做为较高层次的道德修养水平要求——气节，逐渐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生根发芽，成为社会主义公民的一项自觉修养目标。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党和国家，应花大力气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关心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创造大量的符合群众口味的健康文化精品，改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设施，使图书馆、影剧院、公园、广场等文化设施真正发挥它为人民服务的功能。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各级部门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定期积极主动地开展举行一些有目的有计划的群众性活动，教育引导群众在公共场合遵守社会公德，使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这样一个万众一心，人心不倦的社会风气下，“气节”修养必将显示出更加光彩夺目的价值和力量。

教育引导认识主体，加强主观修养

“气节”观念的接受和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都是通过认识主体的信念和行为表现出来的。认识主体包括单个的人和由单个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我们这里指的主要是单个的人，即个体。无论怎么高尚抽象的气节修养，最终还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所以，要提倡“保持气节”的道德要求最终要做单个的人的思想工作。个体的人，不是客观被动的一台机器，而是有主动思维意识的智能人。对于“气节修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认识和主观要求，我们认识的主体——个体的人，应该按照社会对人们气节修养的客观要求，自觉主动地去探索认识，并身体力行。气节修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灵感的一时激发。它是个体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根据自己所拥有的各种主客观认识条件，通过自觉意志的鉴别分析选择逐渐形成的，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基于“气节修养”观念形成的这种特点，青少年朋友们应自觉地加强自身气节观念的修养。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至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又需要不断说明的难题。客观地来说，我们应该反对那种认为当前的所有青少年都是一些深受不良因素干扰的迷茫者或是温室里长大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嫩花的说法。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不论年岁大小，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标准。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一，人类的善恶美丑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也就因人而异。有的青少年，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少年老成，是非善恶观念很强；有的青少年，虽然多一些浪漫和幻想，但在关键时刻能分清正义的和邪恶的；就是极少数受到不良

影响的一时失足的青少年朋友，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燃烧着对美好生活、幸福人生的渴望。因此，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浅薄地妄下结论，一笔抹杀青少年朋友充满思想火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初衷是立足于现状，做一些探讨性的研究分析，和青少年朋友们进行思想交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青少年朋友们参考选择。

正确“气节观念”的形成，必须从认识外在社会和认识自身入手。认识清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的规律与现实状况及走向，搞清楚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明白做人的道理。弄清了这些，就会对人为什么要维护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个体的人塑造自身“气节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很多，这里只浅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建议。

首先立足现实生活，注意观察自己身边周围的一些人际关系细节和社会现象。思考分析这些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比较分析周围人物的言行表现。哪些是文明高尚的，哪些是庸俗卑鄙的，总结人们待人处世的一般心态和观点立场。等自己对一些问题和现象认识考虑成熟之后，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目的有选择地确立自己的为人处世行为准则；在具体事务中多做一些对公对己都有利的事情，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对人对己上做到真诚待人，不卑不亢，自尊自爱自信谦虚谨慎。

其次，虚心接受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正面教育。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基础知识，包括吸取消化那些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做人的道理。在是非善恶观念上，立场鲜明，憎恶扬善。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与坏人坏事做坚决的斗争；积极向正义的美好的事物靠近，做茫茫人海中的一粒珍珠。

再次，坚持经常阅读大量健康的书籍刊物，认真学习领会古今中外那些表现出了高尚气节的英雄人物的非凡事迹。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记载和预测人类社会的过去与未来。那些为了人类正义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不仅为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对后人具有鞭策作用，让人们看到人类人性光辉灿烂的一面。读了屈原的事迹，人们不禁会被他艰苦求索和忠诚爱国的高尚品质所打动。屈原在楚国灭亡之际投身江水，誓与祖国同生共死的坚贞气节辉映日月。今天的人们，难道还没有与官僚作风做斗争的勇气吗？读了《荆轲刺秦王》，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进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壮的境界之中。读了美国独立战争中不为敌人利诱所动，英勇就义的内森·黑尔烈士的事迹，人们往往会被他为祖国独立自由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所感动。读了“巴黎公社的史诗”，更会惊叹于资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也有著名作家朱自清宁愿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够了，一卷卷史书，浮现出一幅幅铮铮硬骨的画像……这些珍贵的精神粮食会哺育你不断地强化良知，在你塑造“气节”的过程中起奔流不息的输血作用。

第四，增加与成功者的交流，探讨他们“气节观念”的变化发展。有选择地参加一些有关道德修养专题方面的讲座或讨论会，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对“气节”的认识。

第五，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内省感悟；把零碎的体验和抽象的理论内化为深刻的持久的信念。在实际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从生活中汲取教训。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使自己的“气节观念”为自

己的人生道路起一个导航作用，为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气节”是一个永恒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品性修养积极态度的概念。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气节观”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气节”修养不再排斥“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催人上进的动力。当代的“气节观”强调的是人们应遵循符合人性的正当的功利主义原则。当代青少年身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要珍惜和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气节观的培养与塑造的这一宏伟德育工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高尚气节的合格公民，让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坚贞民族气节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而优秀的民族。

